

清真寺的社會功能

QINGZHENSI DE
SHEHUI GONGNENG

LANZHOU QINGZHENSI
ZHONG DE ZUQUN
RENTONG

——兰州清真寺中的族群认同

高源◎著

中共民族大學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

QINGZHENSI DE
SHEHUI GONGNENG

LANZHOU QINGZHENSI
ZHONG DE ZUQUN
RENTONG

清真寺的社会功能

——兰州清真寺中的族群认同

高源◎著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创新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真寺的社会功能——兰州清真寺中的族群认同/高源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660 - 0530 - 4

I. ①清… II. ①高… III. ①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兰州市
IV. ①B967. 24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0270 号



清真寺的社会功能——兰州清真寺中的族群认同

著 者 高 源

责任编辑 吴 云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 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530 - 4

定 价 36.00 元

基地学术委员会

杨圣敏 马 戎 郝时远 李 强
李培林 厉 声 卓新平

序　　言

高源博士在这部著作中探讨了当前国际学界关注的两个焦点问题——宗教的功能和群体认同。近 30 年来，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高源的著作没有如当代一些学者那样将大量篇幅纠缠于概念的推敲和逻辑上的演绎，也没有停留于对文献的索引和讨论，她主要以实证的方法，即以自己实地调查来的、新鲜的第一手资料来参与宗教功能和群体认同的讨论。这是本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

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在科学技术还很落后，现代科学还没有产生的古代和中世纪，宗教的最高统治地位是很自然的。然而，当我们已进入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宗教对世界的解释已越来越多地为科学所证明是虚幻的，宗教的说教就逐渐在越来越多的人群中失去了吸引力。在现代科技已为全球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时代，宗教将向何处去呢？这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普遍认为宗教在日益衰落，并终将在我们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加速走向灭亡。

而事实并非如此，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当人类的科技水平又猛增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时，宗教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出现了全球性复兴的热潮。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是如此，信教群众约有 1 亿多人，宗教团体达到 3000 多个，仅伊斯兰教清真寺已有 3 万多所。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是近几十年来全球社会科学界都在关注的焦点。很显然，我们对宗教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以往的研究还不能很好地解释宗教是什么的问题。

除了神学角度的研究以外，传统的宗教学研究主要是文献研究，包括宗教哲学、宗教史和宗教文学等方面。也就是说，主要是在书斋里开展的研究。这样的文献研究已经进行了几百年，而我们对宗教的探讨还远没有认清它的面貌。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不仅是一种历史传统，也是当代一种活跃的社会现象，宗教从未一成不变，它也随着社会的脚步而发展和变化。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其历史和文献中开展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现实社会中去研

究活生生的宗教现象，这是我们解开宗教之谜的关键。这样的研究就是民族学、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任何科学的研究基础都是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而文献材料往往是关于过去的、第二手的、缺少细节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文献材料可以给我们提供当代社会现象的背景，这当然是我们开展研究所必需的，却不足以据此得出可靠的结论。只有当代社会的活的现象、各种活生生的细节、细节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才是最真实可靠的、能够体现事物本质的证据。对当代的活的社会现象开展实证的、细致而全面的调查与研究，是认识宗教最重要的方法。

高源博士对清真寺功能的研究就是以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为基础开展的。她自幼生长于西北，有很多回族朋友，在兰州上大学期间，她曾在清真寺中作过调查，对当地回族人的宗教生活已有基本的了解。兰州是一个有较多回族人聚居的城市，因此她选择兰州作为主要调查点。在调查以前，她用近一年的时间耐心、细致地做各种准备，包括理论梳理、文献资料的搜集与阅读，特别是重点做了细致的调查计划，其中包括对个人的访谈提纲，对清真寺、学校和居民区的调查问题，问卷的设计等，由于目标明确，效率较高，在实地调查的半年内得到了大量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讨论，其分析和总结令人信服，也有不少新鲜的想法。其中，在对清真寺各种功能的调查与探讨中，她认为清真寺对于教众有明显的群体认同功能，并集中篇幅对此作了叙述和总结。

现代社会的群体（族群）认同，也就是“我们是谁”的问题，在现代政治哲学理论的研究中一直处于争论的中心。这是因为，群体认同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对于政治共同体的民主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实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30年来，国际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了相当热烈的讨论，学者们针对全球范围的各种族群现象，特别是族群冲突进行研究，对族群认同是什么提出了很多的解释。综合来说，这些解释主要分为两种，即所谓“客观存在”理论和“主观认同”理论。客观论者主张，群体认同是一种历史传统和客观存在的反映；主观论者认为，群体认同是人类的本能和社会生存的需要，是一种主观的需求和生存竞争的方式。对于这两种理论，学界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述，都是有道理的。各国政府基于对民族、族群的这些认识所制定的各种民族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之中，效果各异。民族之间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竞争如何协调，国家与民族之间统一与分立的问题如何处理，总体来看，至今并无理想的办法。因此，对于群体认同的研究也继续是国

际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学者们都试图探讨和构建能够解决族群冲突的理论和策略。

为此目的，近20年来，在西方学界又出现了一种后民族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或社会团结，应该建立在一系列抽象而普遍的法律之上，而不是如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建立在血缘、种族、语言、文化或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该理论试图让人类的集体认同超越地域、语言、风俗、血缘、种族、宗教信仰、职业、经济和阶级地位等因素，而建立在一系列对现代的生活准则、法律的认同之上。

在有的学者看来，如果这一理论付诸实施，那么他将解决诸多的问题。一方面，他将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团结源泉从过去的对内具有对社会的排斥作用、对外具有侵略性的政治认同，转向更加包容、更加和平的法律认同上来。后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建构也将为世界的未来带来希望：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政治联合体，将是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实现对人权和民主的普遍性的捍卫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办法。

当然，这也许仅是部分学者一厢情愿的想法，人类的认同到底应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如何发展，是国际学界将长期研究的问题。

在这项研究中，高源博士根据清真寺对分散居住的回族城镇居民的群体认同功能作了探讨和总结，她的总结有充分的实证材料支撑，我认为她的观点是正确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她的著作对该项研究有新的贡献，值得学界重视。

杨圣敏

2013年10月11日

目 录

导 论	1
一、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1
二、研究背景:认同·宗教	2
三、理论视角	22
四、田野点的选择与研究方法	23
五、文章框架说明	29
六、论文创新与不足	31
第一章 兰州回族社区历史概况	33
第一节 兰州市建置沿革	33
第二节 历史图景中的兰州寺坊	34
一、明代兰州寺坊的建立	34
二、清代至民国时期清真寺功能的延伸	38
三、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50
结语	51
第二章 当代城市哲玛提	53
第一节 社区与哲玛提	53
第二节 兰州哲玛提文化现状	55
一、家庭文化传承危机	56
二、开放的哲玛提	61
三、人生礼仪的变迁	65
结语	67
第三章 延续与变迁:宗教认同的表达	69
第一节 城市回族的宗教实践	69
一、城市界面下的伊斯兰教“时—空秩序”	69
二、宗教行为模式与信仰	74
第二节 在宗教中寻找归属	78
一、宗教作为一种归属的选择	78
二、向神圣空间的回归	80

三、宗教信仰的功能	86
结语	95
第四章 哲玛提与族群认同	97
第一节 清真寺与哲玛提意识	97
一、哲玛提意识的延续	98
二、居住地的选择	101
第二节 清真寺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105
一、在仪式中建构认同	105
二、符号象征与认同	123
第三节 穆斯林内部的边界	127
一、历史的延续——教派门宦分化	127
二、信仰之间的边界	135
三、穆斯林与“新穆斯林”之间	138
结语	141
第五章 清真寺、社会与国家	142
第一节 宗教精英、清真寺和教民	142
一、清真寺组织制度变迁	142
二、从三个个案看寺与人	144
第二节 宗教与国家	159
一、信仰与民族：两种身份的选择	159
二、穆斯林眼中的民族身份	166
三、国法与教法	172
结语	182
第六章 清真寺在当代城市社会的功能	184
一、族群的符号象征	184
二、实践理性与身份归属	185
三、宗教组织的角色：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结合的中介	186
参考文献	188
附录一 甘肃兰州调查问卷	199
附录二 甘肃兰州访谈提纲	204
附录三 当代兰州伊斯兰文化掠影	206
后记	210

导 论

一、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我在兰州大学攻读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学位时，学位论文题目是《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跨国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利用历史文献，从宏观角度叙述柯尔克孜族文化变迁史。原打算读博期间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但是导师杨圣敏教授认为，一来我不懂柯尔克孜语，二来涉及中亚文化，我又不懂俄语，不论查阅文献还是实地调查都很难。因此，他建议我从身边比较熟悉的、易于交流的民族——回族做起。可学界有关回族的研究成果已很丰硕，从哪一角度入手才能挖出新意呢？他认为，从清真寺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这个角度来写，一定会有意义。

我生活在甘肃，可从小我对伊斯兰教、清真寺、回族的理解却仅限于礼拜和一些众所周知的回族风俗习惯。在兰州上大学后，我曾参观过市区几座有名的清真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但依然觉得和它的距离很远。2007年8月，我在兰州进行了一次调查。当再次站在西关寺门前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那天正好是周五主麻日^①，西关寺门前停了好多辆汽车，庭院里也停满了摩托车、自行车，来做礼拜的穆斯林络绎不绝，见面亲切地互道“色俩目”。看着眼前的一幕，听着那神圣的邦克声，我的内心被触动了。在这个热闹的都市，在这一神圣的空间，邦克声依然传递着回族穆斯林的心声。调查期间，我走访了市区13个清真寺、2个拱北，并做了开放式访谈。一位回族老人告诉我：清真寺是穆斯林的家。这句话促使我不断地思考：清真寺在当代城市社会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回族坚持礼拜难道仅是为了实践信仰？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回族，对自己所属的这一群体、对清真寺又有怎样的认知呢？经过一番思索，我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即对于分散的城市回族来说，清真寺是他们寻求精神归属与认同的空间。因此，我把论文题目定为

^① 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聚礼。穆斯林的主麻日一般是在星期五，这一天的晌礼（一天中第二次礼拜）为主麻拜。

《清真寺与回族认同——基于兰州市回族社区的田野调查》，从认同的角度揭示清真寺在当代社会的功能。

这一选题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当代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城市社会成为人类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领域。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族群成为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不同的族群与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多元的文化，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都市中的首要问题。而族群冲突的原因除了政治、经济因素以外，认同问题日益凸现。回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认同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探讨清真寺的族群认同功能，揭示城市发展中的宗教与民族、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将对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二，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当实证研究结果以民族志特色呈现出来时，都市回族社区研究的取向具有“以点筑面”的效果。传统回族以教坊为核心的聚落形态，在都市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能够清楚地呈现出特定区域中回族的社会互动关系、伊斯兰传统文化影响力的消长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等相关适应现象。而这些现象也正是当代都市回族社区在面临现代化影响时，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第三，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这一论题进行讨论，用具体的田野个案分析当代回族保持认同的原因及其对宗教与民族身份的认知，能够为学界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实地研究报告。

二、研究背景：认同·宗教

(一) 族群认同研究

1. 理论背景

“identity”源于拉丁文词根 *idem*，意即“同样的”，它自 16 世纪起用于英文。^①“认同”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helm James）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詹姆斯用“性格”一词表示内在的认同感受。1921 年，弗洛伊德在《团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文中首次使用这一概念，指个体与他人、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和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他们都从个体心理学角度研究认同发生的过程。

^① 方文：《群体资格：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转引自 Gleason P., *Identifying Identity : A Semant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83 , 69 (4) . pp. 910 - 931.

机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identity 成为英语社会科学中的流行词汇, 这主要归因于新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克森 (Erikson) 于 1950 年出版的著作《童年和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因为这部著作的广泛影响, “自我同一性” (self - identity) 和 “同一性危机” (identity crisis) 等概念广为人知。后来, 菲尼 (Phinney) 又在埃里克森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个体族群认同发展四阶段说, 即弥散性的认同、排斥的认同、延迟的认同及获得性认同。^① 而团体动力学理论的开创者德国心理学家勒温 (K. Lewin), 又将物理学中 “场”的概念运用于心理学中, 认为人心理活动及行为是在一种 “心理场” 或 “生活空间” 中发生的。

社会心理学将认同看做群体关系的系统。乔治 · 霍伯特 · 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提出了认同的社会制约性, 认为认同是主体选择性与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20 世纪 70 年代, Turner 和 Tajfel 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 认为社会认同是由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原则建立的。^② 因此, 认同是社会化中的关键过程之一, 包括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个体认同指个体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 以及与此身份相关的价值观和情感, 它使个体明确 “我是谁”。群体认同是在群体水平上的一种研究取向。群体以其稳定的结构整体, 影响、制约着群体成员的心理活动水平、行为方式以及形成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 同时在个体与群体的互动中相应的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意识。概言之, 认同是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 主要指行动者对自身独特品质或特征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社会学对认同的研究侧重于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认知与归属感, 以及群体中个体间的互动与分化、整合的趋势。

后现代认同理论及其研究取向, 可以说是现代认同理论研究的新趋向。曼纽尔 · 卡斯特 (Maunel Castells)^③、安东尼 · 吉登斯 (Anthony Gid-

^① Phinney J., *Stage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989. 邛进玉:《不同情景中的群体认同意识——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博士论文),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06 年, 第 25 页。

^② Tajfel H, Turner J 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Worchel S, Austin W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 Hall, 1986. pp. 7 – 24.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 载《心理科学进展》, 2006 年第 3 期。

^③ [美] 曼纽尔 · 卡斯特著, 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

dens)^①、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②等人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全球化与现代性对个体或群体认同的意义。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生活在各类群体中，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与群体的互动，他将不成其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族群得以维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族群意识的存在，族群意识表现为族群认同观念，因此，族群认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

“族群”这一概念是人类学和社会学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自开始使用起就有多种定义。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吴泽霖教授主编的《人类学辞典》认为：“族群是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聚集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限在其成员中是无意识的承认，而外界则认为它们是同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或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聚居。因此，族群是一个含义极广泛的概念，它可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居民中的不同文化的社会集团。”^③可以说，“族群”是人类社会群体层次划分的种类之一。在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中，会逐渐产生族群认同意识。所以，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是指族群对自己身份的确认，是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和情感依附。其属于个体对自己身份的一种主观感受，是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心理，这种心理归属能够给个体提供安全感和归宿感，因为人总是趋于认同与自己相似的他人，以寻求帮助和心理慰藉。

人类学界在族群认同研究中提出过不少理论，主要有文化论、原生论、工具论、边界论、国家意识形态论和想象论。^④

文化论是一种比较古典的族群理论，它把不同的族群当作不同文化的承载和区分单位，认为族群之间的根本差别是文化差别，族群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这些差别的消失，因此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文化趋同的加剧，族群问题会最终消解。可以说，文化论指出了文化、行为差异在多族群社会的交往互动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这种问题与政治、经济和阶级问题的关联，但其对于族性以及相关问题的认识过于简单，因此在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② [加]查尔斯·泰勒著，韩震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③ 吴泽霖主编：《人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308页。

^④ 笔者对这六种族群认同理论的探讨是在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的讲义《族群认同和民族主义理论》（2002—2003年）基础上提炼而成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遭到批评和挑战。

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于1969年主编的《族群与边界》对文化论进行了批判。他在导言里首次提出了“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的概念，^①认为族群并不是在地域、经济和社会隔绝状态下形成的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一种人们在社会交往互动中生成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因此，应该从人们互动中存在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和社会整合的必要性来理解族群认同以及族界的生成和维持。可以说，族群认同生成于具有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人群之间的互动，族界主要是一种社会界限，而不仅是地理边界。可见，边界论侧重于边界在认同的维持、延续中的作用。但在一些学者看来，巴斯忽视了人们附着在族籍上的情感以及由政治经济利益导致的族界的拆合和伸缩，有把族界过分本质化的倾向。这就是后来的原生论和工具论的主张。

原生论（primordialist approach）进一步区分为文化历史学派和社会生物学派两个学派，前者的主要代表是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他偏重于分析人们附着于自己历史和文化上的原生情感或象征意义，以及这种原生情感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因此格尔兹认为，族群问题是一种原生情感问题，在血缘、语言、习俗等的一致性中蕴涵着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同时，他也看到了原生情感和公民情感的区别与联系。但是，格尔兹并不认为这种原生情感完全是由实践和互动的必要性、共同的利益或由此招致的义务生成和决定的，他把族群认同当作一种没有起因和源头、自在的难以名状的原生情感。在这一点上，他遭到了一些批评。与格尔兹不同，社会生物学派的代表人物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认为，族群认同并不是什么无理性的、只有绝对意义的原生情感的表达，而是一种根植于人类基因中的生物学理性的外化或表现。在他看来，族群认同是人的自爱和自恋的延伸，这种自爱和自恋有其生物学的基础。也就是说，族群是亲属制的延伸，是在生存斗争中用来达到某种共同目标的工具。^②但是，基因决定族群性、族群是亲属制的延伸的说法是偏激的，不能完全解释历史和现实，并且为族群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服务。而且，其过于重视生物学影响，忽视了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因此遭到不少批评。

工具论（instrumentalist approach）认为族群认同源于对资源的竞争，其

^① Barth, Fredrik,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pp. 9 – 38.

^②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不是原生性的，而是情景性的。阿伯乐·库恩（Abner Cohen）是工具论的早期带头人。他认为族群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而不是种族或文化现象。族群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任何认同都可以看成与一定的权力争取有关，族群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问题，是隐性的、主观的。与库恩不同，保罗·布拉斯（Paul Brass）强调社会精英在唤起和操弄族群意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是，人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出于理性的、经济利益的算计，而是出于对某种人生观和象征意义的追求。此外，任何族群内部事实上也存在利益上的分歧。可以说，原生论和工具论在解释人类行为时都只看到了一个侧面。因此，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提出，任何一种完整的族性理论不应该仅考虑族籍在追逐社会利益方面的功能，还应该考虑建构族群的文化原则。他认为，族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原生关系，族群认同是亲属认同的一种形式，但只有在文化的规划下，并赋予一定的社会功能后，通过追溯世系来构建群体的可能性才能成为现实。简言之，族性不仅有文化的一面，也有社会的一面。

无论把族群认同当成原生情感的表达还是理性选择，都忽视了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在民族认同中的建构作用。布拉克特·威廉斯（Brackette Williams）指出，族群是在民族建设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主流人群的同质性会被民族主义强调和放大，而有别于主流的人群和文化因此凸现出来，而究竟选择哪些文化特质，取决于哪些文化特质最有利于诉求平等的公民资格。可以说，国家意识形态论是从国家层面来解释族群认同问题，视野扩大了许多，但国家对边缘族群和主体民族的建构的这种意识形态行为，也应该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加以解释。

想象论的突出代表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他提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①。在想象、创造、记忆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历史、仪式和自然景观都是重要角色。因此，对于族群来说，它也是一个想象的社群，族群认同是经过人为建构而形成的，强调彼此的共同经验和集体记忆。而史密斯认为，民族不是“原生说”所称的“与社会共存亡的群体”，也不是“想象说”所称的“创造物”和“想象物”，民族是两者的混合，不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定义。族群的核心是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这些是稳定的，是其族群意识的来源。也就是说，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建构不是虚构，要有一定的事实作为基础。

综上所述，族群认同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这种肯定处于与“他者”的互动中，具有场景性。族群认同不仅是情感象征性的，也是工具—政治—经济理性的，因此，探讨族群认同，不能局限于某一理论视角。

2. 国内相关研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族群认同理论进行本土研究时，不再从文化论的单一视角出发探讨问题，开始关注族群边界的变动。李远龙在《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① 中，从族群的自我认同角度论述广西防城港市各族群的认同特征，认为其认同是多面向并呈动态特征的。纳日碧力戈在《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② 中指出，族群认同是特定族群得以维系的基础。但是，认同不是静止的、稳定的或纯粹理性的谋划，而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体现出人作为社会能动体所具有的社会能动性。族群认同是多种因素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场景下互相作用的产物。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背景下，族群认同受到具体的历史遗产、社会记忆、政治因素和利益动机的制约，凝聚了包括政治操作和学术思辨在内的多种社会实践。

族群边界变动的原因是什么？这引起了国内人类学界热烈的讨论。一类观点认为族群边界的变动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持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台湾学者王明珂，他对羌族的民族建构与认同过程的探讨在国内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③ 一书中，他认为羌族作为一个在汉文化与藏文化夹缝中生存的群体，其认同原来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和流动性，只是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政治制度被中国采用后，才出现了具有明确边界和定义的羌族这一民族单位。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④ 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认为正是出于建构符合民族观念的历史记忆的需要，羌族的历史记忆才在近代以来被重新加工、生产，形成新的“历史心性”（historical mood），塑造出新生的羌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他对客观文化特征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认同经常因利益争夺、场景变化和话语转变而流动不定，民族认同是主

^① 李远龙：《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 年。

^②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③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④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观建构的。王明珂能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待族群认同的问题，从而使自己的分析和研究视角具有西方学者所欠缺的深度和广度，这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特点。但也有学者对这种工具建构论持反对态度，如李绍明教授提出，中国对彝族的识别并非如郝瑞（Stevan Harrelle）所说的政治目的大于科学目的，而是具有充分的历史、文化、语言、地缘根据，也符合并反映出彝族原有的对本民族的认同状况。^①他批评西方学者对中国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和历史文献缺乏了解，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的认同确实是建立在相近的语言、生活习俗、地域之上，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并由于民族识别而得以强化。

而另一类观点认为，族群边界的流动仍然应该从族群的文化认知方式和原生性纽带出发进行解释。海力波在《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②中关注族群认同的历史过程。他认为，族群认同一方面受到不同时代主流权力话语体系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特定族群文化中的自我、人观（personhood）、伦理观、宇宙观等认知体系也在对主流的权力话语体系加以回应，形成对主流社会和时代话语的“主位”想象。族群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族群在互动过程中对“我群”、“他群”和日常生活世界所做的分类与文化想象的表征形式。因此，族群认同绝非单纯的工具性博弈手段，也是文化基本认知体系的组成部分。此外，万建中、明跃玲^③看到了原生性纽带的认同建构功能。而彭兆荣的《实践于历史与想象之间——客家群族性认同与宁化石壁公祭仪式》^④一文，认为历史其实是交织着“客观”与“想象”的实践过程，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表述形式的现代性指示价值中，“想象共同体”即其中最重要的特质。他探讨了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客家祖地”的公祠建设和公祭仪典的符号系统的典型性，诠释了族群认同的当代喻义以及作为族群生存策略的基本方式。

不管是从工具论视角出发，还是从文化认知、原生论出发，上述两种观点都重在强调族群的历史记忆，对社会、国家、全球场景的变化关注不

^① 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venaHarrell）教授商榷》，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海力波：《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③ 万建中：《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明跃玲：《神话传说与族群认同——以五溪地区苗族盘瓠信仰为例》，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④ 彭兆荣：《实践于历史与想象之间——客家群族性认同与宁化石壁公祭仪式》，载《思想战线》，2001年第1期。